

【论 文】

论中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

周伟洲¹

提要：本文首先对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著名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撰写的有关中国边疆研究三部代表著作的研究范式进行解析；又对中国国内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三个阶段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总结和阐述。在此基础上，将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或范式之异同作了比较；最后，对西方学者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式作了评述，认为从上世纪70至80年代后，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与西方后现代史学、“新清史”学派等研究取向相同，值得关注。

关键词：中西方 中国边疆 研究 比较 评述

中国历来对其“边疆”的研究均十分重视，至少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撰《史记》开始，历代王朝的“正史”中均有关于边疆民族(“四夷”)及其与内地关系的记述；至清代乾嘉时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及民国时期的“边政学”的兴起，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边疆研究繁荣时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未至今，中国边疆问题凸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因而中国边疆研究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²关于中国国内的“中国边疆研究”，有自己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西方学者的“中国边疆研究”在话语和研究范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西方(主要指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始于近代，其中最具有代表的、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他于1940年在纽约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在中外影响巨大，一再出版，并译成汉文。³此书可以说奠定了西方研究中国边疆的基础。至1989年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撰写并由Blackwell出版集团出版了《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一书(1992年由该出版集团再版)，国内也有汉文译本⁴。国内学者称此书为“在本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⁵至本世纪初，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撰写、200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⁶深入研究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疆(即作者所谓“内亚”)地区的历史，重点论述东北亚游牧民族的兴起及与中国内地诸政权的关系。以上三部先后出版关于研究中国边疆的著作，在中外学界影响甚巨，可以说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边疆的主要流派，其研究范式基本上也是一脉相承。

因此，本文以西方这三部著作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或即西方所谓的“范式”(paradigm，有

¹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² 参见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³ 最近的新译本系唐晓峰据2005年英文本译出，书名《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⁴ 袁剑译本《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⁵ 见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载作者《读史的智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

⁶ 汉译本见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科学研究的模式、模型、范例等义)¹为主，与近现代中国国内的边疆研究作一分析比较，以期有益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推进和发展。

一、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范式解析

研究中国边疆问题，首先绕不开“边疆”（英文对应词一般是 *frontier* 或 *borderland* 等近义词）一词概念和含义的认识。近现代以来，中外学者从不同学科或角度讨论颇多，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²事实上，边疆一词的包含有历史、政治（包括法律）、地理生态、文化（包括宗教）、民族等丰富的内涵；且受到近代国家（所谓“民族国家”）发展相关理论的影响而日益明晰化和概念化。但是，在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中，构成边疆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只有两个，那就是政治和地域两大因素。众所周知，所谓“边疆”是指国家（包括历史上所建国家，拉铁摩尔称为“社会共同体”）疆域中远离中心的“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云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这是中国一般辞书对边疆一词最直接的释义；是属于国家政治体制、治理等政治范畴。既然是边境之地，因此，边疆系指国家一个特定的“地域”，故边疆又是一个特殊的地域概念。在这一特定的地域内，有与域外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有不同地理生态、经济结构、文化和民族等等内涵。因此，研究边疆问题，如果背离了上述的两大因素，就无所谓“边疆研究”。

近现代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较早和影响最大的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及后来的拉菲尔德、狄宇宙等人，他们研究中国边疆的范式的基点，是以他们当时的中国边疆地区，特别是北部边疆地区为研究的具体对象（或称之为地域范围），以这一地区为准来研究古代中国的疆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以长城为界，将当时（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分为长城内各地的“中国本部”，“包括清末时代之18省”；长城外的边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及西藏等地。³拉铁摩尔虽然曾经在当时中国边疆各地亲身进行过考察，但在书中，他并未对当时中国边疆作过多的研究，而是以当时中国边疆的历史（200年前）及形成为其研究的对象。书中说：“我们这一研究的目的，只是检讨历史的某些方面及较早的时代，来建立此后工作可遵循和发展的原则”。“因此，我采取的研究方式和态度是，从而既探寻历史的根源，也了解现代的发展”。⁴总观拉铁摩尔一书，均是以当时中国的边疆为基点，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提出了“边疆形态”（*Frontier style*）、中国（汉人）王朝和草原游牧社会历史循环互动的边疆变迁、古代中国边疆过渡地带（贮存地）、所谓“内边疆”、“外边疆”等理论范式。

巴菲尔德及其所著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继承了拉铁摩尔的研究中国边疆范式的基点，即将近现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内陆亚洲），划分为四个关键的生态与文化区域：蒙古、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及西域地区。⁵从两千多年来这些地区先后兴起的游牧帝国（从匈奴一直到东北满族统一中国）与古代中国（或译为汉人帝国或中原王朝）互动（或称为“关系”）来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其研究方法更多是采取了人类学的方法，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是试图“通过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就可能揭示出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展现出这种在欧亚文化与政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两千年之久的对立局面的完整画面”。⁶拉菲尔德沿袭拉铁摩尔关于古代

¹ 张世明在研究“范式”一词的由来和含义有较详的论述，见其所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² 参见上引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196-239页；张峰峰《西方边疆、边界等相关概念讨论及其对我国边疆研究的启发》，载《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4期等。

³ 上引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8-10页。

⁴ 上引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5页。

⁵ 见上引袁剑译本《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导论，第21页。

⁶ 同上，第5页。



中国(汉人)王朝和草原游牧社会历史循环互动的边疆变迁的理论,重点论述二千多年中国北部边疆游牧政权的政治制度及其兴衰历史,并从其与中国汉人王朝的互动,得出汉人征服王朝与蒙古草原帝国边疆关系相互更替的三个周期。¹

狄宇宙及其著作《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更明确提出其研究范式的基点,是拉铁摩尔的“亚洲内陆边疆”,也即是中国的“北部地区”,“是用来描述中国和内亚之间一条生态学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疆的。今天,这一区域已经完全包括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之内……”也即是满洲平原(东北)、蒙古、新疆地区。²“这个领域有其本身自主的、充满内在辩证性的、历史的以及文化发展的进程”。³狄宇宙在书中,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大致相当于中国西周至西汉天汉元年)的中国西部边疆。他广征博引中外有关的历史文献及考古资料,重点论述这一时期北部边疆一侧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及其兴起(匈奴帝国)原因,及其与中国各王朝之间的关系(互动);深入探讨北部边疆的文化、生态,提出所谓“文化边疆”、“生态边疆”等概念,认为“文化边疆,这一被理解为是不同物质文化的承载者之间进行接触的地域,早在商代就存在于中国北方了”。⁴与拉铁摩尔不同的是,他在认真研究了长城历史后,认为长城的修筑并非各个时期的边界,也并非仅是防御系统,而是中国诸侯国及秦朝在对外族领地进行军事侵略或占领的一种工具,用途极为广泛。⁵狄宇宙比拉铁摩尔、拉菲尔德的研究更前进了一步,主要体现他总结和论述了这约一千年中国内地各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所建匈奴帝国之间的“边界”,按历史发展顺序,分别列出了四条“边界”。⁶

由上可见,上述具有代表性的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范式的基点,是以近现代中国北部边疆(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内亚)的地域为基准,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于是古代中国北部边疆就存在中国汉人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两元并存的边疆,而且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一方的边疆。以此为基点,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就存在两种完全不同二元或双重的边疆形态,成为他们研究这不同的边疆形态而提出诸多理论范式的根据和基础,有诸如“内、外边疆”、“文化边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生态边疆”(草原与平原、山地等)、中间地带、循环论等等理论范式。

谈到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范式的基点,不得不使人联想到本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疆域包含了边疆)的讨论和争议来。作为国内主流观点是白寿彝先生代表的“现今说”和谭其骧先生为代表的“标准说”,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以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或1840年前清代强盛时的疆域为准,来认识和处理历史上的疆域,不能以历史上的王朝的疆域(包括边疆)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⁷上述西方学者中国边疆研究正是以近现代中国边疆(疆域的一部分)的地域范围,来研究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至少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是承认历史上中国这一边疆地域最后形成今日的中国的北部边疆。因此,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式基点及由此形成的各种理论范式,有一定的依据和科学性。

正因为如此,上述三本著作出版后,一再重版,中外学者好评如潮。许多学者认为,上述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式,是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置于东北亚、内亚或世界的广阔背景之下进行研究,突破了国内学界及其影响的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边疆的“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为中心的

¹ 同上,第17页图表1.1及全书的论述。

² 见上引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17-25页。

³ 见上引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第12页。

⁴ 同上,第58页。

⁵ 同上,第9页、第167-186页。

⁶ 同上“结语”,第369-374页。

⁷ 白寿彝《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史疆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正统观”，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中国古代史或古代边疆史的视角；¹与此相关的是，对上述西方学者重点研究历史上中国北部边疆游牧社会的范式，一些学者评价更高，认为是从中国边疆社会发现历史，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²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内中国边疆史研究“历史/政治式”范式所缺失的，正是上述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合性”³和“大边疆观”⁴等等。

二、中国近现代边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历史上即重视边疆的研究，仅中国廿五正史中，均有边疆四夷、藩部等专传，保存了边疆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特别是与内地王朝的关系(互动)的珍贵文献。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受当地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文献带有后来学者批判的“中国中心论”、“汉族为中心的正统观”等等封建史学的特征；但是，这些文献至今仍然是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史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关于中国的近现代边疆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以下分述之。

1. 近现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大致肇始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学及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注重对边疆地区的研究。当时中国清朝一部分有识之士，包括任职的官吏、文人学士，鉴于中国与西方及北方诸国及西北边疆民族接触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有识之士更迫切希望了解西方诸国及他们侵略的中国边疆，提出“以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类似的方针和策略。因此，从嘉庆以后，乃至1840年前后，以西北史地及研究边疆民族的史地、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著、译著大量问世，涉及历史上边疆民族与域外交往的内容，即包括以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内涵。

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特点，仍然是沿袭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没有脱离历史学的范畴，不过更加重视“经世致用”，也开始注意西方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或范式来说，主要是分边疆地区研究为主，追溯某一地区边疆的历史，则以王朝为中心，用传统的封建正统论等理论范式，注重对边疆的王朝统治一隅的边疆及其治理的研究。这一研究理论和范式，对后世中国边疆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显然，与上述西方中国边疆的范式是有差别的。

2. 到民国时期(1911-1949年)中国的边疆研究发生了大的变化。这一时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深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中国近代化艰难的推进，西方近代文化也进一步传入中国。其中，与中国边疆研究相关的是，通过国内的精英(主要是留学生)将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传入到中国，并开始应用于边疆研究。到上世纪30至40年代，在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侵华的抗战时期，中国的边疆地区首当其中，为日本等列强侵略和宰割的对象。在这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关头，全国各阶层，特别是国内有识之士，更加关注边疆。当时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一些自然科学家纷纷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的边疆研究已出现了“边政学”的学科名称；同时也出现了“边疆学”的名称，如1933年在《殖边月刊》上首次出现此名称，但影响不大。

边政学突出的是边疆的政治、治理问题，这是与当时边疆的形势有关。但其内涵也包括了对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民族研究等方面的内容，与现代的中国边疆研究的概念及内容可以说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边政学理论的构建和实践，是在当时边疆危机、民族存亡的关

¹ 见上引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译者序，第3页；上引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475页等。

² 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载《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465-466页等。

³ 上引袁剑《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及其所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译者的话。

⁴ 袁剑：《“内陆亚洲”视野下的大边疆：拉铁摩尔的实践路径》，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历史观》，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头，上自政府下至一般百姓均关注边疆问题，边疆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已由过去传统历史学之下的史地之学，而逐渐形成为由新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介入，多种学科综合的新的中国边疆研究。

边政学及当时中国国内边疆研究仍然是以当时中国边疆各个地域为主要研究对象，且多以史地学、地方史、民族史等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视角进行研究。除以各边疆地区为视角的研究之外，民国时期也出现宏观研究中国边疆的论著，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多在“中国疆域”的大范围内对边疆的研究。这些著作的出版，与当时西方列强及日本侵华，中国领土沦丧的形势有关。主要的论著有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地理》(文信书局1944年)、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等等。这些著作大多承袭中国史地学传统，只论述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及边疆，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封建史学的束缚，但是这些著作开启了宏观研究中国边疆的先河。另有当时兴起的中国民族史学中出版的以《中国民族史》为书名的一系列代表性著作，绝大部分是关于历代中国边疆民族的系统研究。¹

3.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可以说是中国边疆研究的繁荣时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已初步构建了“中国边疆学”这门综合的学科。这里，笔者不准备对这60多年中国边疆研究各阶段的发展及繁荣的情况，再作论述。²仅集中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发展与主要观点之上。

上世纪50至70年代，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关于中国边疆的研究是以其他学科领域之名进行的，边疆地区的研究仍在继续。比如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大部分为边疆地区)颁布的一系列法规，包括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政策，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等。又如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少数民族五种丛书的编纂；在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视阈下对边疆地区的研究，特别是70年代关于帝国主义(主要是沙皇俄国)对中国边疆侵略的研究；中印、中苏边境的战争所引发的相关研究，等等。

在史学领域内，中国国内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逐渐破除和清算了大汉族的封建正统论，树立了民族(包括历史上少数民族)一律平等的观点。这对以史地学为主的中国传统边疆研究观念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影响极大的《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均将历史上边疆民族历史视为中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增加了边疆民族历史的内容。

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边疆研究开始逐渐进入繁荣时期。在80年代至90年代末世纪之交，这一阶段边疆研究虽然以“边疆史地”的研究为主，但重点逐渐向边疆的现实研究转变。但是，主导这一阶段的边疆研究仍然是边疆史地之学，虽在实践上有所突破，然于中国边疆学的本身的理论构建，却无多建树。于是在世纪之交，国内学界重新构建现代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中国边疆学呼声不断，已迫在眉睫。

从20到21世纪之交至今，中国边疆研究更加繁荣，特别是处在西部边疆的新疆、西藏地区，三股分裂势力，“疆独”、“藏独”的分裂活动及合流，严重影响到该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边疆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再次凸现。这一切促使边疆研究重心转向边疆现实的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边疆研究之中，使原来以历史学为主导的

¹ 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1928、1932年北平文化学社)、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5年世界书局)、宋文炳：《中国民族史》(1935年中华书局)、缪凤林：《中国民族史》(1935年中央大学)、林惠祥：《中国民族史》(1936年商务印书馆)等；还有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演进史》(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等。

² 可参阅马大正、刘遂，《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边疆研究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发表、出版有关边疆的论著数量和质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¹

在重新构建中国边疆研究(边疆学)的理论方面,这一阶段更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除上述开始对上世纪“边政学”的研究之外,对如何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研究更是取得大的突破。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马大正先生。他从2001年开始,先后发表十余篇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论文。此外,他在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总序》中对“边疆”含义及主要理论作了简明的阐释²;201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一书,更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全面论述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现实及理论问题。总之,经过约一百多年、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21世纪国内学者对构建现代中国边疆学学科的不懈的追求,目前在中国边疆研究,即边疆学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上已初步确立。虽然在表述上和个别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其基本涵义或精神是一致的。笔者曾作了一些归纳:

(1)关于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定义(或称为概念、定位等):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历史及现实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一门综合、交叉的学科。³它既是基础学科,也是实用的学科。前者是学科的研究的对象,后者是学科的性质、特征。

(2)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解读。首先,关于“边疆”的含义,学者有各种解读。按各类词书及学者的通俗解释:边疆,“边境之地”;或是“靠近国界的领土”;“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或云离京师较远的领地;较远靠近国境的地区及地带等。这都没有错。实际上,“边疆”的内涵极为丰富,且与其综合、交叉学科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从纵的方面看,边疆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应是其与历史学关系密切的原因。因此,中国边疆史地学、边疆考古学当为中国边疆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它事实上,也涉及到历代对边疆的政治、治理、经济、文化和民族,与许多学科相交叉。

从横的方面看,边疆又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一个国家内区别于其他地区,邻近边境的地区,有它独特的地形、气候、矿产和生态环境等自然条件。这与自然科学中许多学科(地理学、地质学等)相关;也包含了这一特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多方面的问题。

它又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因为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有边疆的政策、治理(包括行政建置)及思想、边防、外交等凡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内涵。于是有“边政学”或“边疆政治学”的分支。

它又是一个地域经济的概念,有其独特的经济类型、生产方式、对外贸易等内涵,于是有“边疆经济学”的分支。

它又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概念,边疆独特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等内涵,及那里的人又由各种民族所组成,边疆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经济、文化、宗教,甚至跨国民族等也皆为边疆的内涵之一。于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介入边政学之中。现今“边疆民族学”、“边疆人类学”、“边疆社会学”等分支也必将兴起。这些分支学科与现实边疆研究结合更为紧密,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

它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边疆地区独特的文化(往往是多元文化的并存)及与域外、内地的文化交流、边疆文学等,也是其内涵之一。⁴

以上对“中国边疆”的解读,可以视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之内涵及各分支边疆学构建的架构,也是对其作为一门综合、交叉学科的注释。

(3)关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认为,即然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其

¹ 关于这一阶段边疆研究及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此处从略。

² 见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3页。

³ 有的学者用“边缘学科”欠妥。

⁴ 以上可参阅上引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200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第1-3页。



研究方法应如马大正先生所说：“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¹。需要补充的是，在研究中国边疆时，视其研究内容而有时偏重某一学科的方法，而兼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研究边疆治理，则主要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而兼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²。

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内相继出版了一批探讨中国边疆研究(边疆学)理论和宏观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如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包括《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国海疆通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和《西南通史》等七部，中洲出版社2000-2003年先后出版)。这套《丛书》及总序可以说奠定了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基础。另有郑汕著《中国边疆学概论》(201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吴楚克著《边疆政治学》(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罗崇敏的《中国边政学新证》(2006年人民出版社)、梁双陆的《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的发展》(2009年人民出版社)、吕一燃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刘宏煌著《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上中下三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等。

除此而外，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各个地区的研究之上，而且分别形成了一些专门学科，与西方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趋势是一致的³。如研究西藏地区的“藏学”，研究新疆地区的“新疆学”、“突厥学”，研究蒙古及东北地区的“蒙古学”、“阿尔泰学”等等。国外对这些地区的研究，重点在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等方面；国内则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这些研究领域内，国内在近30年突飞猛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国外相比毫不逊色。而以中国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多与中国边疆研究有关。如边疆各自治区纷纷编写出版的地区通史、地方志；中国古代至今边疆的每个民族在国内都有研究论著出版，成果丰硕⁴；历代边疆与境外国家或民族的交往、跨国民族、近代边界的划分等也是成果累累。

然而，在如何认识和确定历史上(古代)中国的疆域(包含边疆)的问题，国内学者也有分歧和争议。如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历史上中国疆域、边疆的主流观点是“现今说”和“标准说”，这两种观点在处理中国古代疆域范围的观点或原则，从研究中国历史或中国疆域史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以现今中国或清代盛时疆域、边疆为基点来认识和确定古代的中国的疆域和边疆，就会产生以今天或清盛时形成的疆域和边疆替代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和边疆，也即是上述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的“二元”边疆；或如国内有学者否认古代中国有不断变化的疆域或边疆，有的只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天下观”下的“天下”⁵，或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⁶等。

当时，以笔者及东北学者张博泉、张碧波等学者不同意上述的主流观点，认为所谓“疆域”、“边疆”是国家政治的概念，无国家哪有疆域和边疆。古代的中国是指古代中国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内包括历代统一的封建王朝及统一王朝分裂后的各王朝，它们在政治上能控制(统治)的领土，即当时的疆域及其内的边疆。统一与分裂在中国历史上循环，直至清代，中国近代疆域和边疆的最后形成。⁷

¹ 见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载《东北史地》2011年6期。

² 参见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³ 参见励轩：《美国的中国边疆地区研究现状》，载《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46期，2011年10月31日。

⁴ 可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⁵ 见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3期；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载《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4期。

⁶ 见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

⁷ 详细论证见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3期；张博泉：《论古代边疆民族与疆域研究问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碧波：《关于历史上氏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兼评“一史两用”史观》，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我们不同意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756-757页，对关于历史上中国疆域三种观点的评述。他说：“但实际上三种类型的观点分别谈的是历史书写、历史疆域、疆域沿革三个不同侧面和维度的问题，并未处于共同知识话语交流平台之上，



事实上,无论中国传统的史地学也好,还是21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的论著,如上述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刘宏焯著《中国疆域史》、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田澍、何玉红主编的《西北边疆社会研究》(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程妮娜著《古代中国东北民族地区建置史》(2011年中华书局)等著作也好,都是与我们所论古代中国疆域和边疆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国内学界对中国古代疆域和边疆的沿革、变化,大多是以这种认知为基础的,包括中国历史地图的绘制。

三、中西方“中国边疆研究”之比较

美国学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18世纪(清代初期)中国的边疆管辖的论文中说:“‘边疆’一词有多种内涵,然而却有两个基本的分析传统:一个是欧洲传统,强调不同国家之间固定边界的产生(如法国边疆);另一个为北美传统,意指多元文化互动下的广阔地区。现代汉语中的边疆一词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边’指地区方位,‘疆’意指隔离的边界”。¹而中国学者张世明总结西方边疆理论的话语范式建构为“自然疆界论”、“科学疆界论”和“相互边疆论”,并对三种建构作了详细论述,指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是属于“相互边疆论”的范式建构的。²由此可知,首先在对“边疆”一词的含义和认知上,中国与欧洲、北美等国在话语(语境)上是有差异的。中国的“边疆”一词,如前所述,强调的是国家政治管辖的“疆域”部分和“边境”的地区(地区方位)。

在中西边疆研究的话语中,“范式”(paradigm)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如今在中国也有学者开始使用。张世明在其大著《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一书中,对西方的“范式”一词,作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范式的原意有科学研究的模式、模型、范例等义;最后结论是“所谓‘范式’这一概念问题,与其说是在说明科学革命,不如说是为给正常的常规研究(normal research)以特征而设想的概念工具”。³仍然未对“范式”的具体的含义作出通俗的、科学的界定。与近现代中国的边疆研究而言,没有与西方“范式”含义相同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之相近似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两种概念至少在主要的含义上有相通之处,只是话语的不同而已。

在当代,中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话语差别最大的是,对中国古代所建王朝的表述与认知。上述西方三部著作,称古代中国二元边疆的一方为“中国”(China或Chinse)有时也称具体王朝名称,即历史上中国汉人(或主要从事农耕的国家或民族)所建的政权(国家);称北部边疆另一方为“游牧帝国”(Nomadic Empires)、“游牧力量”(Nomadic Power)。将中国历史上仅汉人(汉族)所建王朝称为“中国”,非汉人所建王朝为“异民族统治中国”,是西方乃至日本学界较为普遍的观念。而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将古代中国称为“历史上多民族统一国家”,它包含历史上所有汉族或少数民族所建的王朝(政权),有统一的王朝(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等);也包括由统一王朝分裂后所建立的数个割据王朝。

在弄清中西方关于中西方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特别是主要话语的差别后,再进行两者的比较就容易理解和深入得多了。

关于近现代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西方多有共同之处。在研究的视角和范围上(即上述西方研究范式之基点),中西方是完全相同的,即以近现中国实际的边疆地区为研究范围;研究以分边

并不具有可通约性,其间鲜见实质性交锋与反诘,以致取向既殊,结论自异,彼此达成“大一统”的共识格局迄今渺然难期”。平台就是如何认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三种观点从某一方面看,有它的合理性,但在认识、处理中国疆域问题则分歧突出,争论与反诘尽在上引论著之中。

¹ 见濮德培著,牛贯杰译:《比较视野下的帝国与国家:18世纪中国的边疆管辖》,原文发表于《近代早期史杂志》2001年第5卷第4期,译文载《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² 上引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六章边疆理论的话语范式建构,第363-487页。

³ 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第二卷边疆民族,第158-159页。



疆地区(如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的深入研究为中西方研究深入和发展的趋势;而宏观、或部分宏观的研究也有所进展(如上述西方三部著及中国国内关于中国疆域史、边疆史的综合研究著作等);在研究的理论及方法或称范式上,多学科的引入的综合研究均成为中西方的发展趋势。

中西方在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西方的研究在对分边疆的研究上,重点在这一边疆的社会及文化、经济类型、宗教等方面,研究多综合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中国国内的研究,重点在对历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这一边疆的政治治理和边疆政策方面,但也注意其他方面的研究(如边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早期研究多应用历史学、政治学(故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政治式”),自上世纪30至40年代多种学科开始介入,到本世纪已逐渐形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中西方对古代中国的边疆的理论或范式研究则差异较大。如前所述,上述西方的三部著作重点是古代中国边疆的研究,其研究范式的基点是以近现代中国的边疆范围作为古代中国边疆的研究范围。于是,出现了“二元边疆”,即古代中国的边疆和与之对立其他民族或国家(如北部边疆的“游牧帝国”)的边疆。有学者称之为“复合型”边疆或“大边疆”。其研究的重点在以上对立边疆的关系(互动)之外,主要是对古代中国边疆对立的边疆,如北方的游牧帝国的研究。正因为如此,故其研究中出现了诸如“内边疆、外边疆”、“文化边疆”、“生态边疆”、“中间地带”、“循环论”等概念和“范式”。

而中国国内对古代中国边疆的研究,其视角和范围是指各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中邻近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边境地区(边疆),这一边疆地区随着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兴衰、统一或分裂,而时有伸缩;但每个时期边疆只有一处,而非上述西方的“二元边疆”。这是完全符合古代“中国的”边疆的含义。于是,研究的重点除注意当时与境外民族或国家关系(当时边疆的形成、范围必须涉及)的同时,更多地是研究当时多民族统一国家对这一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至于古代这一边疆及与之对立的邻近民族或国家的研究,国内则分由地方史、民族史或中外关系史所承担。

总之,上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与中国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比较,其差异的根由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者话语、研究动因与取向、治学的路径、关注的重点、历史书写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差异所形成的。

四、西方“中国边疆研究”评述

上述以美国拉铁摩尔等三名学者的在中国边疆研究上,提出的“二元边疆”及相关的“范式”,对于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最主要的启示和可资借鉴的主要是:在研究中国边疆(无论古代或现代边疆)时,应更加注意边疆内外民族或政权的互动关系,将国内地方史、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中对边疆地区的研究成果应用或“聚焦”于边疆研究之中。换句话说,即应进一步加强多学科对边疆地区的综合研究,使“边疆政治学”、“边疆经济学”、“边疆民族学”、“边疆人类学”、“边疆社会学”等分支学科日益向前推进。

但是,上述西方学者提出古代中国的“二元边疆”论,虽然中外学者多有“复合型”、“大边疆”等赞誉;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仍有商榷、讨论的必要。问题的核心是对古代中国的认识上,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有连续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包括其分裂时期),还是许多王朝先后并列,或仅是内亚和东亚的一个地域。前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依此,各个历史时期仅只有一个不断伸缩变化的边疆,而不会有两个边疆,所谓“二元边疆”论是值得商榷的。

然而,重要的是上述西方学者,特别是巴菲尔德、狄宇宙等人,他们在“二元边疆”的论述中,特别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社会及其所建政权一方,勿视、淡化当时古代中国及其边疆的另一方。这种研究取向被有的学者认为有益于破除中国国内的“中国(汉人)中心论”,是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等等。研究“中国的”的边疆，不以中国为中心，难道以东亚、内亚、欧亚乃至世界为中心？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而非汉人的中国）这个具有连续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才有了从古代以来中国不断变化的边疆。近几十年来，国外有的学者纷纷将研究中国的视角转向中国的边疆、边缘的研究，据说也是有消解“中国中心论”的用意在内。事实上，近现代中国对边疆游牧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仅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内已成果累累，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已超过了西方¹，怎么能说，西方对游牧社会的研究才发现和拯救了中国历史？

关于中国疆域(包含边疆)中心与边疆的关系，笔者在总结中国疆域发展特点和规律时曾提出：“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以历代统一政权或相对统一政权大致相对集中的核心或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也即是这些政权京畿所在地区。过去学者称之为“中原地区”，事实上，确切地说，在明代以前，这一核心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明代后在今北京地区。这一核心地区是古代中国疆域的中心地带，其四邻是自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设立郡县制的广大地区，再向外即实行羁縻政策的边疆民族地区。正如一个圆的中心（京畿）及圆的边沿（边疆民族地区），没有圆的中心、核心就没有圆边，构不成圆；而没有圆边，也无谓圆；中心、核心相对稳定，而圆边则处于经常拓展、变化之中。古代中国疆域正是有了历代统一或相对统一政权的中心，才有了对边疆地区的凝聚力，才有了上述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和特征。”²

事实上，从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学者从中国的区域研究、亚洲史(东洋史)及后现代史学中研究中国“复线历史”、“新清史”等研究取向，其目的就是“消解”、“解析”所谓的“中国中心论”或质疑“中国同一性”。³在中国边疆的研究上，上述巴菲尔德、狄宇宙对中国边疆游牧社会的研究取向，是与上述思潮是一致的。

更有甚者，是上面提到的美国学者濮德培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西征：清朝征服中央欧亚》(*China Ma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的著作，此书序言中说：“我选择‘中国西征’作为本书的书名，是很慎重的，因为这是一个被当今中国民族国家所认可的征服事件。但它是‘清的征服’(Qing Conquest)，而不是‘中国的征服’(Chinese Conquest)，因为其中主要参与者里有很多不是汉人中国人(Han Chinese)；之所以选择‘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一词而不是更常用‘中亚’、‘蒙古’或‘新疆’，是为了表明帝国获取这片领土的范围之广、疆界之模糊”。⁴又说：“本书对现代中国历史学中的一些主导范式提出批评，这些范式主要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出现，也被一些西方学者所接受。简而言之，海峡两岸的历史学家都受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在的疆域和文化边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将对蒙古和新疆的征服看作是中华民国发展到顶点的结果，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话说，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了中央欧亚的众多民族”。⁵

在这里，濮德培等西方学者是将古代汉人所建王朝才视为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王朝(如辽、金、元、清诸王朝)，视为非中国或异民族征服中国；清朝统一(征服)新疆等边疆地区，是非汉人的清(满族)的“征服”，不是“中国”的重新统一(征服)。这是对今天中国对边疆地区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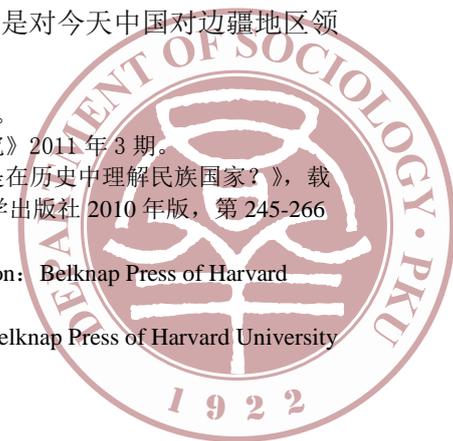
¹ 参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 60 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² 周伟洲：《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索》，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 3 期。

³ 参见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载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45-266 页。

⁴ P. C. Perdue, *China Ma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ess, 2005, p. xiv.

⁵ P.C.Perdue, *China Ma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ess, 2005, p.1.



土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挑战。¹事实上，濮德培的上述观点是近几十年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学派的研究取向和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强调清朝与历代汉人所建王朝的区别，强调清朝统治中满人的因素，淡化汉人的因素，以中国学者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或以破除“中国汉人中心论”的名义，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中国边疆研究，甚至“中国”、“中国人”提出挑战和质疑。²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在西方中国边疆研究中，上述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的“二元边疆”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或称新的“范式”)，如“内边疆、外边疆”、“文化边疆”、“生态边疆”等。如果说，这些概念仅指对“二元边疆”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西方一些学者对古代中国王朝一方的边疆，仍然采用这些相近的概念来分解、研究中国的边疆。如由德国傅海波(H. Franke)、英国崔德瑞(D. Twitchett)主编之《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一书“导言”中，在论及唐朝北部边疆时，认为“唐代中国的‘边界’(边疆)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于是存在着不变的“生态学边界”、唐朝军事防御体系的界线和文官管理的界线。³这种将唐朝的边疆分解为多层次的边疆或边界，混淆了唐朝疆域内真正的政治管辖范围的边疆，将唐朝在边疆的军事防御体系，如羁縻府州制与内地的建制(郡县制)都划为有不同的边界的边疆，是欠妥的。因为这是唐朝对边疆及内地建制和治理的差别，而非边疆的多层次问题。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借鉴上述西方中国边疆研究的概念和范式，提出了也应从“政治边疆”(有形的边疆)和“文化边疆”、“经济边疆”(无形的边疆)的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的边疆(包括古今中国边疆)。⁴有的学者更是从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特殊复杂国际形势，提出必须转换边疆理念，推进“多元边疆”的研究和实践，所谓“多元边疆”，即包括“领土边疆”(海、陆、空三疆)和“战略边疆”(利益、信息、文化、太空边疆)。⁵还有的学者提出，“古代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重边疆体制，内边疆是郡县区的边疆，是作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区的边疆；外边疆是非汉族居住区、帝国的边缘区，这才是帝国真正的边疆”。¹

前两位学者在认可古今中国边疆的是政治疆域(领土)的前提下，提出两种大致相近的观点。前者提出有形的“政治边疆”，还有无形的“文化边疆”、“经济边疆”；“无形的边疆”，颇令人费解？文化、经济都是“有形的”；是指政治边疆界内的，或是包括边疆外的文化边疆、经济边疆？其含义是指边疆还可按文化、经济来划分，或指边疆内的多元文化和经济类型的交融？如果指后者，何必煞费苦心借用“文化边疆”等西方概念，不如将此词改为“边疆文化”和“边疆经济”，与上述边疆学相关分支学科边疆文化学、边疆经济学相衔接。后者提出的全球化国际形势下的“多元边疆”论，其中“领土边疆”，是指当今全方位的边疆，它已是由现代各种国际法所规定的；而所谓的“战略边疆”，作者认为，是指“形成了与边界领土边疆交错而不完全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边疆—利益边疆”内实施，这种提法是否有咄咄逼人、向外扩张之嫌；如真涉及边疆外邻国，那是与邻国加强文化、信息等的交流，或在国际法规定范围内实施的问题。因此，所谓“多元边疆”论，是不可取的。

至于有学者提出的中国古代“双重边疆体制”，显然与拉铁摩尔的“内、外边疆论”及上述

¹ 关于对濮德培书的评论，可参阅王欣《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第1-6页。

² 关于“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可参阅上引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³ [德]傅海波、[英]崔德瑞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9页。

⁴ 见上引王欣《中国边疆学构建面临的几点理论挑战——以拉铁摩尔、狄宇宙和濮德培为例》，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3期，第1-6页。

⁵ 何明：《探索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边疆理论与实践》，云南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丛书》代序，见方铁《边疆民族史新探》，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代序》，第1-8页。



西方学者对唐代边疆的“多层次论”观点相近。古代中国内地实施郡县制的地区，非边疆，不能划为或称为“内边疆”；所谓“双重边疆体制”，实际上，是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对边疆治理与内地的不同，以此来构建“双重边疆体制”，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借鉴西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努力探索中国边疆研究创新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对国外一切有益和有利的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己国家边疆的传统。笔者对上述学者的质疑，仅是个人一孔之见，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讨，并最终由实践来验证。

【论 文】

中亚诸国国族建构中的政教关系问题²

常 安 *

内容提要：中亚诸国在其独立后的国族建构中，尽管在各国宪法中强调了国家政体的世俗属性；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强化、现实民意迎合、对西亚等国的外交拓展需求等实用性、功利性目的，有意无意的对伊斯兰复兴思潮推波助澜，从而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进而损害到其自身的国族建构。痛定思痛之后，中亚诸国在后来的制宪历程中重新夯实、强调政教分离这一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并力推宗教事务的法治化，从而确立宗教与政治的法律边界。

关键词：国族建构；伊斯兰复兴思潮；政教分离；宪制；

一、现代国家与国族建构

国家，无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国家形态；但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更多的实际上是指现代国家。在 20 世纪的社会学大师韦伯看来，现代国家首先体现为一整套制度或者机构，并以特定的领土为界限，但最为关键的是，“现代国家是个制度性的支配联合体，它已经成功的确立了在一定领土之内对作为支配手段的物理暴力的垄断权”；甚至，根据韦伯的观点，归根到底，只能根据国家所特有的手段，即物理的暴力（Gewaltsamkeit），对现代国家进行定义。其他诸如埃利亚斯、奥尔森等学者对于现代国家的界定也均不约而同的强调了国家对于权利和暴力工具的垄断属性。但这种“权力的垄断”、“对内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的依据何来？或者说现代国家的公民缘何要认同这个国家及其统治体系？对此，一般的论证主要从国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公共性角度和国家产生于人民订立社会契约的民主论角度着手：如强调国家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与税收的权力，目的不在于为国家机构自身或国家机构的成员谋求福利，而在于为一国的人民提供“公共产品”；³而民主论的

¹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载《史学集刊》2012 年第 2 期。

² 本文原刊载于《原道》第 24 辑。

*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³ 参见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 年第 6 期。李强的定义，实际上是分别吸取了韦伯对于特定领土上国家对于暴力权力的垄断的强调、埃利亚斯对于税收权垄断之于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的分析，和奥尔森强调国家与土匪团伙或者黑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垄断暴力的承担